

板本學

楊峒著述及其《律服考古錄》稿本考略

郭明芳*

楊峒(1748-1804)為乾隆時期山東著名經學家，其著作不少，然生前多未刊刻，至其歿後，或有散逸，或有人加以蒐集，分別刊刻。其著作總數有多少，未見有人整理，相關研究至今仍無進展¹。今僅據光緒《益都縣圖志》藝文記載有六種，是否還有其餘著述，有待再耙梳。其次，臺北國家圖書館藏一部《律服考古錄》，作者著錄為楊峒，版本項著錄為「清稿本」，又著錄有「清劉文淇、胡培翬等墨筆、朱筆批校」。劉文淇、胡培翬是否真有批校，筆者懷疑這樣的說法，應再進一部查考其實，以便使事實真相大白。現通過本文，擬就楊峒著述與國圖藏《律服考古錄》稿本等問題，一一考訂之，如前錄有誤，及時訂正，勿使貽誤，俾提供學界研究新訊息。

一、楊峒生平

楊峒生平見於光緒《益都縣圖志》卷三十九〈列傳〉：

楊峒字書巖，應奎族人。父永祥，事寡母以孝稱。峒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幼讀書能強記，尤專力諸經注疏及《史記》、《漢書》諸書。得顧炎武《日知錄》，好之，遂肆力於古學。繼又讀閻若璩、朱彝尊、萬斯同、胡渭、江永、戴震諸儒之書，傾倒甚至。而於顧、戴兩家，尤所服膺。然無標榜扶同，貪奇炫博之習。其講經論史，析理辨物，□至於精覈而已，故博極群書而不騁其辨，參稽眾說而不紛其心，一時推為通儒。作文嚴於義例，不規規然襲前人形貌。嘗誦長洲汪氏之言，謂曾蘇非古文，如李泰伯《退居類稿》、司馬溫公《傳家集》，拙多於巧，樸勝於華，乃真古文也。教人學必先以訓詁治注疏。縣人先無讀《說文》、《爾雅》者，有之，自峒始。知縣錢塘周嘉猷，儒吏也，欲刻于氏《齊乘》，兼為考證其誤，草創未就而病革，峒卒為成之而不尸其名。知府汝陽李炤武、武功張玉樹先後折節訂交，且延主松林書院。十應禮部試不第。嘉慶九年卒，年五十七。著有《毛詩古音》、《律服考古錄》及詩文集。又有《鄉黨圖考注釋》，為

*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

¹ 有關楊峒經學研究情形，查《經學研究論著目錄》或檢索「中國知網」等資料庫均未見。

人竊去，竟佚。無子，以從子為後。²

此篇文字為《益都縣圖志》據李章甫撰〈行略〉及〈邑先輩紀略〉所改寫，足供瞭解其生平與學術。

又據今人沙嘉孫編《山東藏書家史略(修訂本)》³載，益都楊氏又有楊岍者，「字松巖，工醫，好購書，置數千卷，皆手自校勘。」(頁 257)

由此可見，益都楊氏為讀書家庭。

二、楊岍著述考

吾人據《益都縣圖志》楊〈傳〉知其著述有四種。再，同《志》卷廿五〈藝文〉亦列岍著述六種(頁 304-305)。現刪汰重複得有七種。除此之外，據今人王紹曾編《山東文獻書目》⁴又得一種。其三，再耙梳各類文獻，共得楊岍著述十一種。現整理如次：

(一)《毛詩古音》三卷，存

是書書名或作《詩古音》。光緒《益都縣圖志》〈藝文〉著錄，並列有〈自序〉，其云：

自序曰：「宋以後言古音者，博學多識則吳才老，而其失也泛，就詩求言則陳季立，而其失也固。惟顧寧人《音學五書》、江慎修《古韻標準》，擇精語詳，歸於簡易，毛大可、邵子湘諸人不敢望也。余九歲受《詩》，以今音讀之，苦其聾牙。《集傳》雖有吳才老之音，而彼此遷就，字無定切，嘗私心怪之。夫音有古今，亦如南北異言，不可強合，而其遞變之故，自有源流，不識今音，焉知古讀？顧氏始以偏旁求聲，就二百六韻部分考古音之離合。江氏精於《等韻》，所作《四聲切韻表》，二百六部為百有四類，至蹟而不可亂，所以能循末會本，使三代遺音不墜於地也。今條舉三百篇入韻之字，列其與今異讀者，合二家之音為之注，間有未安，則下以己意，且別為凡例，如左庶乎口吻調利，不以聾牙為苦，其於玩辭審音之功，或有助焉。」案，是書光緒初年，昌樂閻湘蕙於李文藻家故書中搜得之，存青州同善堂。

²〔清〕法偉堂纂《光緒益都縣圖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10月），冊33，影印清光緒三十三（1907）年刊本，頁539-540。

³ 濟南：齊魯書社，2017年1月。

⁴ 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12月。

《山東文獻書目》著錄：「稿本、清末抄本，《販續》、省圖、省博」（頁 87）《山東文獻集成》第三輯影印山東省博物館藏民國間濰縣丁錫田家鈔本（李有經校並跋）。又天津圖書館藏清抄本。

(二)《律服考古錄》二卷，存

光緒《益都縣圖志》〈藝文〉著錄，又稱「有自序」，未列全文。今據臺北國圖藏稿本列述如次：

五服之差，儀禮為密。然其文簡而例該，且多散見於傳記。注疏之說，非好學深思者，不能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兩漢而降，迄於六朝，禮服專家著錄《五代史志》者，凡七十部、三百一十卷。雖其間甲乙聚訟，言人人殊，而經傳明。文初無異論，自唐人始改父在為母與嫂叔甥舅諸服後，唐及宋復為舅姑三年，明洪武初遂併齊斬而壹之，於是禮服之遺靡有存者矣。峒，魯人也，不習于禮。頃在家塾，客有以五服問者，檢律文視之，或曰：「予古□服」，則檢《儀禮》示之，久而病其煩也，取律服錄以為主，而考《儀禮》及歷代之不同者，其於左，用者不重其唯，議□無正文者，必援□之其，或一時權制，如唐為出嫁母三年，五代為姨舅，大功之類則別附于後。傳記注疏外，旁摭眾說，有與禮律相推闡者，亦頗載焉。禮服之變及魏晉以下諸儒之論議，惟杜氏《通典》為詳，今多引之，愚管隨文附見。至若《儀禮》所列，大夫降服諸條，非今世所行典，夫褻物之宜變，除之節為律所未及者，則概不復著也。嗚呼。古今之禮，無不變，顧其始未嘗遽異而卒。至于相懸者，時為之也。《開元禮》之異於《儀禮》者尠矣，宋《問賓通禮》之於唐，明《集禮》之於宋，亦然。迨《孝慈錄》之作而其與《儀禮》異者，不可勝窮。然苟察其所以變而泝迴其源流，不過循唐宋之故，踵而增之耳。蓋沿革之不可以不具也如此。近常州汪氏為《古今五服考異》八卷，沿革略備，而其書條目錯陳，或不為閱者所使。愚故以律為輕，而古今之異同皆類從而件繫之。錄成，藏諸篋，行既以謝踵門之請，又蒙誦邱文莊公之言，以為國家律文。首載服制□正以違于禮則入于律，今此區區者，亦時與懷刑之君子□進于知禮也。益都楊峒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是書所輯者凡三種，一為益都楊書巖峒所撰《律服考古錄》，以為律由禮出，違於禮則入於律，故參稽古書，撰為是書，以考其正。」

《山東文獻書目》著錄：「光緒十九年趙達儀刻本、《販記》、山藝。」(頁 34)又光緒三十四年武進李氏《聖譯樓叢書》本。

按，李祖年(1869-1928)原名祖紳，字紀堂，號縉臣，江蘇武進人。光緒二十(1894)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山東文登、歷城、泰安、益都知縣，山西寧武擇州、汾州、太原知府。民國初任陝西財政司長、財政廳長。袁世凱稱帝，棄官返鄉。工書善畫，精鑒賞，兼通醫學。著有《聖譯樓叢書》，修《文登縣志》，並刻《益都縣圖志》。

又臺北國圖藏此書稿本，今影印收入《清代稿本百種彙刊》冊 17。按，該書影印時將另紙批校部分全數刪去。

又傅斯年圖書館藏虛白吉祥之室鈔本。

(三)《鄉黨圖考注釋》，佚

《鄉黨圖考》十卷為江永撰，楊峒為之註釋。光緒《益都縣圖志》本傳載，「為人竊去，竟佚。」

(四)《齊乘考略》六卷，存

光緒《益都縣圖志》〈藝文〉著錄，稱：「此書無單行本，即附著《齊乘》各卷後。乾隆間，益都知縣周嘉猷重刊《齊乘》，因作〈考證〉數十條，未成，疾革，以屬門下士楊峒參訂卒業。據原書有段松苓諸人分校，實峒總其成也。」

今見清乾隆四十六年胡德琳序刊本，此本於每卷後考證者，應即此本。

按，胡序云：「(胡德琳)改守登州，道出益都，與明府周公兩膝偶言及是，君與余有同志，遂憊愚以成之，原書中嘗有舛誤之處，君又為考證若干條，附於各卷之後。」北大、武漢大、南開與哈佛燕京等館藏。

(五)《汲古堂稿》二卷，未見

光緒《益都縣圖志》〈藝文〉著錄。今未見，疑下列《書巖剩稿》為此書殘存。

(六)《古文抄》二卷，存

光緒《益都縣圖志》〈藝文〉著錄。《山東文獻書目》著錄：「《楊書巖先生古文抄》二卷，清楊峒撰，稿本(丁培基、李章府題跋)、舊抄本，《善目》、《販記》、省博。」(頁 394)又李靈年、楊忠編《清人別集總目》著錄：「《楊書巖古文鈔》二卷，抄本(北京圖書館)，《楊書巖先生古文抄》二卷、《師經堂存詩》一卷，嘉慶抄本(魯博)。」魯博藏本，今影印收入《山東文獻集成》第三輯。

(七)《詩稿》一卷，疑存

光緒《益都縣圖志》〈藝文〉著錄。李靈年、楊忠編《清人別集總目》著錄：「《楊書巖先生古文抄》二卷、《師經堂存詩》一卷，嘉慶抄本(魯博)。」

按，《師經堂存詩》一卷，疑為此書。

(八)《書巖剩稿》一卷，存

《山東文獻書目》著錄稱，「《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叢綜》(《中國叢書綜錄》)、省圖」(頁 393)

按，《叢書集成初編》底本為《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又李靈年、楊忠編《清人別集總目》著錄：「《書巖剩稿》一卷《叢書集成初編》本。」

《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所收為民國十八年紹興墨潤堂刊印，今日各本皆出自於此。今所見有影印，分別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冊 78 與《百部叢書集成》(底本為「《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前有同治六年會稽趙之謙識語，略云得書始末：「益都楊君書巖以樸學著稱，與曲阜桂大令、棲霞郝戶部交善。余遊山左，曾求其著述不可得，偶從廠肆見殘稿十餘紙，半有戶部題識，亟攜歸，編為一卷，以存其文。」由此亦見楊氏歿後，未有刊行，著述散逸，賴後人得之，分別刊行。是書收峒文章十三篇。

(九)《古今尺步考》不分卷，存

古今尺步田畝道里考 益都楊峒書巖

曲阜孔季重曾得江都閔氏所藏銅尺當今工部營造尺七寸有奇文曰應歷尺原古音讀與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建初後漢章帝年號蓋即五代史所謂漢管尺也季重作漢銅尺記及周尺攷辨直以爲周尺誤矣余從其同縣桂君未谷許得所奉周尺爲顏樂清家藏以脈經咫尺寸圖尺之法與九府泉刀八寸加二寸或十寸之說校之皆合比今部尺裁六寸四分其尺之長短既殊而步數又多寡不一此田畝之大小道里之遠近所以相懸也王制以古今尺計田里相當之數而所指時世卒難臆定諸傳記皆先秦舊書周

古今尺步攷

曲阜孔季重曾得江都閔氏所藏銅尺當今工部營造尺七寸有奇文曰應歷尺原古音讀與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建初後漢章帝年號蓋即五代史所謂漢管尺也季重作漢銅尺記及周尺攷辨直以爲周尺誤矣余從其同縣桂君未谷許得所奉周尺爲顏樂清家藏以脈經咫尺寸圖尺之法與九府泉刀八寸加二寸或十寸之說校之皆合比今部尺裁六寸四分其尺之長短既殊而步數又多寡不一此田畝之大小道里之遠近所以相懸也王制以古今尺計田里相當之數而所指時世卒難臆定諸傳記皆先秦舊書周

《晚學集》附古今尺步考書影

《書巖剩稿》附古今尺步考書影

本書見於《書巖剩稿》，又或名《古今尺步田畝道里考》，一卷，臺北國圖藏，著錄「舊抄本」，附於抄本桂馥(1736-1808)《晚學集》末。該本末有百二識語，云：「余於戊戌仲冬過益都，在錢巽齋山長處得楊君是篇，因急錄之。據此則夏時五十畝僅當今十二畝耳。三代之尺，周尺最小，夏尺稍大於周，然亦不及今十五畝也。以十餘畝之產，可贍一家八口無他，用力勤耳。楊君長於考據，惜迫於程途，未得一訪其人為憾。百二識。」

按，戊戌年，從楊峒在世至清末共有道光十八(1838)年與光緒廿四(1898)年等兩年份。跋文稱錢巽齋，巽齋吳江人，嘉道時人，故以道光十八年之說較符合時間點。

再，國圖藏抄本文字與《書巖剩稿》有小異。

(十)《金修北齊臨淮王像碑記》一軸，存

據「全國漢籍資料庫：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著錄，清楊峒撰文、何晉修書，署嘉慶七年，日本東北大學藏拓本。

(十一)《周兩賡先生行狀》一卷《墓志銘》一卷，存

楊峒撰，清勞氏丹鉛精舍抄本，一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按，周兩賡即周嘉猷。今日印入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彙編》。

三、臺北國圖藏《律服考古錄》稿本流傳考

臺北國圖藏《律服考古錄》二卷，該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⁵著錄：

《律服考古錄》二卷 2冊 清稿本 書號 00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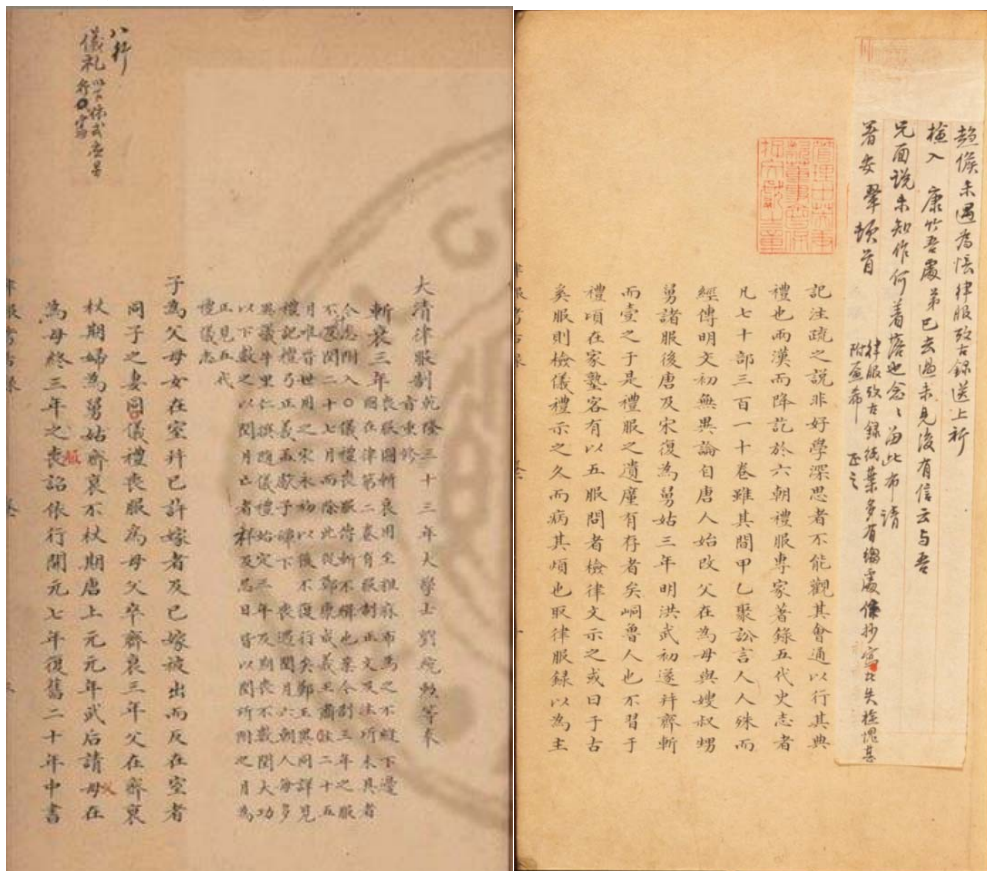
清楊峒撰，峒，益都人。

全幅高 28.1 公分，寬 17.4 公分。每半葉十行、行廿二字，每節提行，小字雙行夾註。版心花口(筆者按，國圖古籍影像檢索系統作「版心白口」)，上方記書名「律服考古錄」，中間記卷第(如「卷一」)，下方記葉次。

首卷首行頂格題「大清律服制」，其下小字雙行。次行低一格題「斬衰三年」，其下小字雙行。卷首有楊峒序。書中有清劉文淇、胡培翬等墨筆、朱筆批校。

⁵ 臺北市：國家圖書館，1996年6月。

書中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朱文方印、「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保/存文獻之章」朱文長方印、「葉名/澧借/書印」白文方印。
(頁 137-138)



國圖藏本書影

該館古籍影像檢索系統著錄亦同，然著錄有劉文淇、胡培翬批校有問題。屈萬里《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未著錄是書。《清代稿本百種彙刊》收入是書始見有「清劉文淇、胡培翬等批校」說明。

劉文淇(1789-1854)揚州人，胡培翬(1782-1849)安徽人，兩人時代稍晚於楊峒，且此書僅在山東流傳，何能得此書？筆者認為著錄劉文淇批校或許因為本書有「文淇案」，未加詳查文淇為何人，類推為較著名之劉文淇之故。而著錄胡培翬則未知所由，本書批校者除「文淇案」外，又有「文楷案」。又朱筆批校未知何人，未見有胡培翬及相關證據。前人或以胡氏精於禮學，而將此書歸之耶？

此本「文淇案」寫於「益都縣圖志」紅格紙上，劉文淇與益都無淵源，且《益都縣圖志》為光緒末期所修，與劉文淇生卒時間不合。是書又有「文楷案」，文楷為孫文楷，亦益都人，曾參與光緒《益都縣圖志》纂修，如卷三十九〈儒學傳〉趙汝弼傳卷末云：「以孫文楷、趙資深採訪修」（葉十四）。又光緒《益都縣圖志》卷廿二〈選舉志〉著錄：「同治十一年舉人，孫文楷字□山。」（頁 266）又同卷〈拔貢〉著錄：「同治癸酉，孫文楷，府學，見舉人。」（頁 273）

文楷，《清史稿》有傳。

文楷字模卿，山東益都人。同治癸酉舉人。潛心著述，尤精金石之學，以收藏貧其家，力耕自養，恆屢歲不入城市。有《適野集》、《一笑集》，皆詠田事詩也。遜位詔下，家人秘不以聞。經月，忽入城訪友歸，即仰藥自盡。將死，囑其子曰：「吾行吾所安耳，毋謂我死節也！」著有《老學齋文集》二卷，《今吾吟草》四卷，《稽庵古印箋》四卷，《古錢譜》等書。

文淇或亦孫姓，然其生平無徵。

此書前附有書札一通，文云：「超侯未遇為悵，《律服考古錄》送上祈檢入，康竹吾處弟已去過，未見，後有信云與吾兄面說，未知作何著落也，念念為此布，請著安。□頓首。《律服考古錄》紙葉多有皺處，條抄寫□矣，□□□附益希正之。」

康竹吾為康紹鏞(1770-1834)之子，約同光間人。此札稱請超侯校正，超侯未知為何人，或為文淇之字號，亦未知。

此書應楊峒歿後散出，為時人所得，蓋光緒《益都縣圖志》卷 25 藝文志著錄「毛詩古音三卷」並言「是書光緒初年昌樂嚴湘蕙於李文藻家故書中搜得之，存清州同善堂」。此時曾經葉明澧借閱觀覽。後又再經孫文淇、孫文楷批校。後稿本為李祖年修縣志時所得，後並帶回鄉加以刊印。祖年歿後，書稿乃散肆上，至抗戰期間為文獻保存同志會所購得，歸於國立中央圖書館。

本書歸入國立中央圖書館以降，或未詳加查察，致使將「文淇案」誤為劉文淇，又有此書為《儀禮》之書，誤另墨筆批校者為胡培翬。今透過此文略加考察，終能還其真相。筆者一直以為，從事館藏古籍整理為接力賽，亦即一代一代人接力完成對一書的認識，古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者是也。